

探測文學生活的第一步

——台灣作家人口的調查分析*

邱德亮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文學社會學研究的最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對一個社會的文學生產狀況進行最基礎的調查，其中又以生產者的作家人口調查為最。而文學社會學正在台灣興起之際，本文嘗試補足台灣文學研究長期最缺乏關於台灣作家人口整體的基礎研究：社會人口學的分析。利用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庫所收集的2,638位作家小傳，加以結構化並補充父親職業資料後，我們也以傳記集合法（*prosopography*）獲得為台灣作家人口的整體資料。這使得原本只是補助性背景的文學生活資訊，得以轉化成能夠以社會科學方法去量測（*measuring*）整個作家人口的強大且結構性的資料。本文因此將台灣作家人口視之為一個社會群體，試圖以簡單易懂的量化方法來描述這個社會群體的基本社會特徵：性別、省籍分布、世代、教育能力等；我們也仔細分析了其中1/3作家人口的家庭背景了解其社會出身的來源，也討論了社會群體最特殊的雙重或多重的職業活動特徵。

關鍵詞：文學社會學、台灣作家人口、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社會人口學描述、社會出身、雙重或多重職業活動

* 本文為筆者科技部計畫「戰後台灣文化菁英的社會學描述I：文學場域」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6-2633-H-009-002，承蒙補助謹致謝忱。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

The First Step to Measuring Literary Life:

A Survey on Writers' Population in Postwar Taiwan

Chiou Der-L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One of the fundamental tasks of literary sociology is to offer a survey of the condition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within a society; furthermore, a survey of the writers' population is the fir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in understanding the literary life of a society. I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literary sociology studies in Taiwan, this article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fundamental which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and understated. Using the database "2007 of Catalog Taiwan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established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which has collected 2638 writers' biographies, we have created a structured prosopography of Taiwan's writer population, and also added their fathers' occupations. This makes it possible to convert the writers' biographical accounts from accessory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to powerful structured data which allows us to measure the writers' population with scientific methodology.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aiwan writers as a whole social groups, and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ir basic social characteristics: sex, provincial distribution, generation, education, and social origin (for which there was information available for roughly 1/3 of the total profiles). Finally, we discuss the unique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who engage in dual or multiple trades.

Keywords: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Taiwan Writer Population, "2007 of Catalog Taiwan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Socio-demographical Description, Social Origin, Double Life and Poly-activity

探測文學生活的第一步

——台灣作家人口的調查分析

一、前言

若要理解一個地區的文學生活，沒有比紀錄作家活動或生活的素材，如傳記、日記、軼聞或掌故等更能透露其樣態。這些素材或出於紀念或仰慕某作家，紀錄了他們的種種社會生活資訊。這些大量的文學生活資料，不但在文學研究作者論時成為必要的題材，用以分析他個人的生長經歷與作品內容之間的關係，也同時是文學史在分析文學現象時不可或缺的資料，它提供了某種「外部分析」輔助性訊息。因而，相對於作品內容的內部分析，文學生活的描述與紀錄往往被文學研究放置在次要和輔助性的位置，畢竟它只是文學生產的副產品，即使有些或可成為作品，然都屬較次級的文類，像生活散文、傳記，甚至報導文學的形式被生產。

相較於此，社會文化史或文學社會學對這類文學生活的紀錄就顯得重要許多，他們較珍視這些文人作家或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及交友形況的真實紀錄，理解他們的社會生活與工作狀況，乃至於生存條件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料。因此，文化史學家（如P. Burke, R. Darnton）或文學社會學家都會非常重視文學生活的種種資料，至少和作品一樣，將它視之為研究文學現象的重要素材。他們甚至開發各種研究方法要充分探索這類資料，以便能以社會科學的方式描述或解釋文化的社會史或文學生產的運作模式。以文學社會學而言，從過去哲思式到調查式研究典範的移轉後，¹確立了三大研究領域：文學生產與流通的

1 這裡哲思式文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指的是從G. Lukacs到L. Goldmann及法蘭克福學派等，將文學文本視為社會的反映或再現，不論是從中發掘某種時代精神、情感結構和反抗的力量，或視之為意識型態的支配加以批判（P. Macherey, T. Eagleton, J. Jameson）；調查式研究傳統的文學社會學則將文學事實視之為一種特殊的社會事實加以研究，會將文學的生產、流通及接收的社會效應視為社會現象加以研究，這種傳統可溯源於英國的I. Watt的《小說的興起》，但要到R. Escarpit的波爾多學派確立了生產-流通與接受鐵三角的研究典範，影響所及Bourdieu的場域理論、R. Darnton及R. Chartier的書籍流通與閱讀的研究，到後布爾迪厄後諸多法國文學社會學的研究，R. Charle, R. Ponton, A. Viala, N. Heinich, B. Lahire, G. Sapiro。即使是作品社會學（sociology of works），研究旨趣與議題也與哲思傳統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關於文學社會學研究典範的變化，限於篇幅無法充分說明，還需另闢專文討論。

社會狀況、作品社會學、讀者的接收社會學。作家的文學生活各種紀錄與書寫成為文學生產與社會狀況調查是難得可貴的資料，特別是理解作家這個社會群體的人口特徵。當然為了解作家的文學生活，社會學家善用他們熟悉的調查研究方法，從深入訪談到問卷調查都不排除，但是遇到已逝或早期作家人口時，文學生活的書寫紀錄就成為必要的工具了。但是面對這類龐雜又多樣的文學生活書寫紀錄如何以社會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即是文學社會學家要面對課題。

雖然文學外部與內部視角的分析一直都是文學研究者與社會家之間緊張關係的張力。儘管社會家一直被質疑解讀作品的的能力與方式，也同時督促了作品社會學的誕生並確立其鐵三角（文學生產與流通－作品社會學－閱讀社會學）的穩固地位。反觀文學生活，對文學研究而言儘管重要，但相對以作品為核心的研究傳統則是較次要與邊緣的地位，因為被歸類於外部視角。儘管如今這種以作品為核心來區分文學世界的內部與外部視角，作為文學研究與文學社會學知識生產的分工已經受到諸多挑戰而不再被簡單地接受，然而各自研究傳統長期累積的特色卻不必因此抹除。尤其在台灣文學社會學的研究還正在形成，我們見到了以文學文本建立起來的台灣社會學論述，如蕭阿勤²關於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或蘇碩斌³以旅行文學文類在1990年代文學界以「旅行文學」對抗「旅行平庸化」危機的文學鬥爭。反而外部視角的研究則相對稀少，除了王梅香幾篇論文⁴利用美國外交檔案研究冷戰期間美援文藝體制如何影響台灣與香港華文文學生產外，許多基礎的研究都尚未建立，如文學作家人口的調查與分析、作品文學生產狀況資料、文學作品如何被中介而流通、甚至文學作品的銷售量等研究。本文希望補足台灣文學社會這種基礎不足的缺憾並踏出第一步，專注在台灣文學作家人口的社會人口學調查。

對於社會學家來說，首先的課題就是文學生活可不可能量測？做為文學事實的文學生活，可不可能像其他的社會事實一樣，以社會科學的方法來測量

2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12）。

3 蘇碩斌，〈旅行文學之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9期（2014.09），頁255-286。

4 如王梅香，〈不為人知的張愛玲：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下的《秧歌》與《赤地之戀》〉，《歐美研究》45卷1期（2015.03），頁73-137；王梅香，〈文學、權力與冷戰時期美國在臺港的文學宣傳（1950-1962年）〉，《臺灣社會學刊》57期（2015.09），頁1-51。

它？換言之，如何以社會科學的方法去描述它？這不意謂就是客觀，尤其是實證論的客觀性，而是儘量減少研究者主觀的價值判斷。如作品好壞的文學評價，評價系統應該是被研究的課題，而非研究者涉入自己的判斷，而是根據某種可以被檢驗的研究步驟與程序，對所觀察到的文學現象與事實進行描述與解釋。面對龐雜的文學生活資料，首先的問題就是如何給它一個整體性的全貌？如何客觀地描述此一文學生活的全貌？以什麼方法描述才能充分代表某一個時期或國家地區的文學生活？

為了盡可能客觀有代表性地掌握文學生活全貌，文學社會學有兩種常見的方法：一是借助Bourdieu文學場域的結構分析；另一種是針對文學生產（生產者及作品）、流通（出版品），乃至接受（讀者）的質性或量性調查研究。事實上，兩者不但相互相成，甚至不能偏廢。⁵前者是根據支配與被支配關係標示文學生產者的位置以及獲得位置的正當方式、分析專家評論的有限生產與市場取向的大眾生產區隔、文學生產的自主性可能性及如何其受制於文學以外的政治或市場力量，文學神聖化與經典化運作機制等。後者依據選取樣本的規模、時間、地區、對象種類（作家人口、作品或讀者群）進行不同尺度的量性描述。所謂量性描述不見得以統計表示，文學社會學所使用統計表述頂多只是百分比和簡單的圖表即足夠，⁶有些則是以訪問方式進行質性調查如人際關係的網絡分析或作家身分認同的問題研究。本文試圖提供一種以社會科學方法探測文學生活的其中一種：作家人口的社會人口學描述，亦即說明戰後台灣作家做為人口群體的社會特徵？他們是誰？數量有多少？性別、年齡、省籍／族群分布如何？他們來自於哪裡？社會來源如何？作家人口的社會流動如何？他們的社會出身或家庭背景都出自何處？在台灣社會是什麼有利的條件，他們在不同時期比較可能成為作家。他們雖然是作家，但都從事什麼職業？這些職業分布會不會影響其文學活動，如何影響？這種文學生產者在職業限制下的雙重生

5 這種掌握文學生活的研究方式應該都是Bourdieu極於追求的，雖然在他的《藝術的法則》量化研究比較運用在出版流通方面。但從他其他作品如《區判》（*Distinction*），或幾個他指導學生的著作可見都沒有偏廢。

6 有些不排除運用更複雜的統計技術，如路丹妮用多變量分析法（*Multivariants analysis*）分析戰後初期（1945-1948）台灣文學場域的位置與分布，路丹妮、陳正賢，〈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台灣文學學報》27期（2015.12），頁153-190。

活（double life）或多重職業（polyactivities）又是如何？

二、文獻回顧

關於文學世界鳥瞰式視角的研究在台灣比較熟悉的可能是場域理論。Bourdieu 的場域理論確實帶給新一代文學研究新刺激與新視野，因為它同時可顧及不同場域內部因為不同位置而競逐正當性的成聖化，和外部權力場域之間的力量關係投注在與不同文學機構的作用力。此一研究取徑的好處是能以鳥瞰式掌握文學場域獨特運作邏輯，透過不同位置之間關係的分析，探究文學場域的自主性（autonomy）、成聖化（consecration）、文學價值等級的決定等諸多問題。台灣文學研究自從文學場域概念與方法被引入後，就針對美學位置、有限生產與大量生產、相對自主性，乃至於市場機制的研究開始明顯增多。不論運用場域概念的空間、作家群與時間尺度多大，這類研究都能相對於作者論的研究，都根據其選擇的尺度勾勒了一個文學世界或文學生活的大致或示意性的全貌。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張誦聖《台灣文學生態：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⁷書中不只勾勒出決定文學生態的外部力量如何從國家主導轉變成爲市場決定歷史結構性變化，正如其副標題所示，同時也描繪了在此轉變過渡期間（即所謂軟性威權體制）新形成文學生態的各個美學位置（反共、現代主義、純文學、主流文學、本主位置等），最後探討了台灣文學市場如何走向菁英文化與中產文類的分層發展。可惜場域理論的運用僅止於文學場域內部分析，對外部權力場域還是以強弱軟硬的威權體制一筆帶過背景，而在分析市場力量立基的中產品味時卻以電影文本取代文學作品的市場銷售（而且該電影楊德昌的《恐怖分子》還不是文學作品改編）。另外，應鳳凰⁸也針對戒嚴時期（特別是五〇年代）作家進行過「場域分析」，不過這比較接近傳統作者論的研究，再將不同作者放置在場域的不同位置。繼此，劉乃慈⁹論證台灣小說在

7 張誦聖著，劉俊、馮雪峰等譯，《台灣文學生態：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中國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2016.09）。

8 應鳳凰，《文學史敘事與文學生態：戒嚴時期台灣作家的文學史位置》（台北：前衛出版社，2012.11）。

9 劉乃慈，〈九〇年代台灣小說與「類菁英」文化趨向〉，《台灣文學學報》11期（2007.12），頁51-74；劉乃慈，〈九〇年代台灣小說的再分層〉，《台灣文學研究學報》9期（2012.10），頁69-104。

解嚴後的1990年根據市場需求不同在場域內部開始有分層現象，一方面部分作家追求成為高層文化，另一方面有些則「置於／被置於」中層位階。自從張誦聖引入場域理論後對台灣文學研究的影響之一可能是重新發現文學市場的力量，不只是張誦聖與劉乃慈認為解嚴後台灣文學越來越走向被市場法則支配，王鈺婷¹⁰也論證，事實上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在報紙副刊，既已出現以迎合市場取向的中文文類像書信體散文。黃美娥¹¹更借用「場域論」論證，1945-1949年間台灣文學即在《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出現大眾化口味的本土通俗作品，並遭逢挑戰與威脅而被批評。

這種場域理論的問題還是集中在經典作家及作品的分析，所謂文學場域的全貌事實上往往僅限於幾十個知名作家的描述而已，無法顧及全體作家。正如 B. Lahire 對場域理論的批判，除了幾個顯著有影響力的犖犖大者外，事實上大部分場域內部的成員也都沒有進入分析視野。其次，場域理論所分析的成員似乎天生全職的場域人（being-in-the field），他們好像生而知道其中的遊戲規則，也全心地投入其中而看不見他們在場域以外的社會生活。就文學場域而言，Lahire¹²認為Bourdieu場域理論雖然強調文學場域與外部權力場域的社會空間的同質共構，但卻忽視於每一個文學家也都有其社會生活，文學活動可能只是他們諸多職業休閒活動中非常認真投入。因為文學作家必須靠其他職業來生存才能創作的雙重生活（double life）是文學界眾所皆知卻又有意忽視的常識。事實上，就在此眾所皆知但又集體忽視的矛盾中建構起文學生活的浪漫又純真信念（illusio）。於是場域理論只針對文學界中傑出顯著者分析，也不會注意支持以他們文學創作的社會與經濟條件，而讓人以為這些被研究的作家才能代表文學場域。

就如同Franco Moretti詰問文學研究的長期習慣：文學史研究作家與作品真具有代表性嗎？例如英國維多利亞時期，難道努力讀完200部經典作品，

10 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藉此感謝作者慷慨贈閱這本論文。

11 黃美娥，〈戰後初期台灣通俗小說初探——從「作家論」到「場域論」的考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6期（2018.04），頁185-220。

12 Bernard Lahire, "Champs, hors-champ, contrechamp", in *Le travail sociologique de Pierre Bourdieu: Dettes et critiques* (Paris : La Découverte, 2001), pp.24-57.

就可宣稱掌握了維多利亞文學嗎？相對於當時出版如今默默無聞的2萬部作品，就算這200部經典作品具有多大的文學價值，就能證明它們代表維多利亞文學？也許那些當時出版量大的次級品作品或因為通俗而不太有文學特色的作品，才能看出真正的維多利亞文學。¹³ 筆者不同意Moretti關於遠距閱讀（distant reading）想法與做法，更沒必要追隨他在史丹佛大學的「文學實驗室」裡，瘋狂地以大數據分析文學文本。¹⁴ 但他的提問卻可以刺激我們想像不同研究文學現象的可能性。非經典性的作品或許因為其文學價值不高，以至於在文學史上不見經傳，但是卻反而很具有歷史價值，尤其是社會史的價值，因為「平庸」作品也許最說明當時的文學生產狀況。¹⁵ 同樣的道理，這也就是為何文化史學家偏好流傳廣播的版畫做為圖像研究對象，而不取名家繪畫作品做為一般人對肖像體態研究的證據。平庸作品的社會學價值如此，所謂「經典名家」以外的一般作家也更是如此，以社會史的角度來看作家這個文學生產的社會群體的話，事實上眾多名不經傳的「一般」作家也許要比幾個亮眼的名家更能說明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也因此更值得文學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但問題是如何去研究這些人數眾多的一般作家？

另一種能以鳥瞰式掌握文學生活的社會學的視角，就是關於作家生活與文學生產的基礎調查。文化史家或文學社會學家將不同時間的作家、文人或知識分子視為一個社會群體進行社會史研究或社會調查研究，或說明某一個時期的文化或文學生產狀況。這種文化生產人口的基礎調查有助於掌握整個文化產業的形成與發展，也是進一步分析這些文化事業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時最基礎的論據。這種研究取徑以掌握文化或文學現象全體為立意出發點，致力收集各類可信的資料，用以簡單的計量方式描述並解釋當時文化或文學現象。但缺點是可能將活生生的文學人埋沒在大量的數字資料之中，就像筆者學文學出身

13 Jennifer Schuessler, "Reading by the Numbers: When Big Data Meets Literatur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30, 2017, (URL: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30/arts/franco-moretti-stanford-literary-lab-big-data.html>).

14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15 這不意謂文學社會學不重視作品「文學性」，只不過它不是做為衡量作品高下好壞的判斷依據，而是視為作品與作家獲得認可而神聖化和經典化的研究對象之一。畢竟作為社會科學一員的文學社會學家應該避免涉入主觀的價值判斷，即使是依據文學性的價值判斷。

的同事對這種取徑的批評：「那些複雜又細緻的文學心靈如何能夠以圖表顯示？」的確沒有，這種研究取徑無法呈現「複雜又細緻的文學心靈」，但這不正是文學研究作者論以及文學批評的工作，文學社會學家從來沒有要越廚代庖。後者向來都很認分地以社會學的調查方法，將文學世界的種種現象當做社會事實一樣進行研究。這就好像我們無法要求人口學家去解釋人們「複雜又細緻的心靈」，因為那是精神分析的工作。我們不至於緣木求魚，想要從人口學的金字塔圖去是無法解釋人們內心的複雜世界。

關於作家人口的調查，不同的研究者以不同名稱指稱：R. Escarpit一開始就用了一個很不精確的詞「文學人口」（*population littéraire*），N. Heinich則用社會型態學（*morphologie sociale*）、G. Sapiro則用作家的社會來源（*recrutement*），其實大致都指的是一般英語世界會用社會人口學（*social demography*），也就是對一整個群體作家人口的社會特徵的描述，本文則選擇以簡明的「作家人口」來指稱。這種根據所選定調查對象與時期不同，這種社會人口學的描述對不論是文學社會學、文化史或社會史的研究都非常重要，它是奠定這些研究領域的第一基石。有了這個基石後，文學社會學或社會文化史方能順利開展。

由於在台灣從來沒有針對文學作家人口組成（或任何藝術文化的人口）進行過任何調查研究，以至於這方面的知識一直停留某種眾所皆知但未驗證過的「印象」所構成的文學養成教育，也缺乏整體全貌性的理解。一方面對傳統社會學家來說，文學人口太少通常不會出現在社會調查樣本裡，少數已涉及文學的社會學研究，還是以文本分析為主，另一方面文學史的研究卻一直集中在部分具有文學價值的經典作家研究，不論是個人或團體，但都沒能以整個作家人口為研究對象，更不會以社會調查的方法。因此必須借重國外的研究文獻，特別是這方面研究處於領先位置法國的文學社會學。幾個研究企圖對不同地區與時代的作家人口進行大型的調查研究。Alain Viala¹⁶利用在1643年和1665年之間出版過作品的作家559名進行過調查，這群文人（*gens de lettres*）

16 Alain Viala.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9).

開始區隔與教會有關的大學學者，他們以推廣法文的絕對權力為基礎，對抗當時歐洲博學知識的語言拉丁文。R. Darnton¹⁷ 利用三個版本的《文學法國》（*La France littéraire*）（類似文學年鑑）的傳記（1757〔N=1187〕、1769〔N=2367〕、1784〔N=2819〕）分析了法國大革命前的作家人口的社會人口學組成，進行推論知識階層人數的增加可能也是促進大革命的社會力量之一。James S. Allen¹⁸ 標識了560名1820-1841年間的法國浪漫主義作家群，他們明顯的年輕化（1820-1830年時平均年齡從47歲下降到41歲），而且作家的職業中，靠筆而活的記者、文人劇作家和翻譯家的比例從1820年的10%增加到36%，顯示作家人口專業化的程度。Remy Ponton¹⁹ 則考察過1850到1900年，法國文學市場生成的關鍵年代的616名作家（出生於1820-1870），論證1860年後新一批的心理小說家（*romancier psychologique*），他們比起前一代自然主義小說家（*naturaliste*）不論在社會出身和教育資本上都要高，許多在大學都上過心理學課，能夠轉化成小說創作的生產。此外，G. Sapiro²⁰ 也針對二次大戰期間185位維琪政權下的作家進行調查他們如何在德國占領下的法國適應或反抗，哪些作家選擇什麼創作與出版的政治策略在不利的政治環境生存，文學的生存策略選擇與其他社會出身是否有關？B. Lahire²¹ 也以問卷方式調查生活在隆河－阿爾卑斯山地區（*Rhône-Alpes*）出版過一本著作的作家503位，研究他們「雙面生活」的文學條件，文學創作不只是需要第二個文學以外的職業方能支撐，甚至對這些外省地區的文學家而言，文學創作更像是「正職」以外的非常認真而嚴肅的文學遊戲。

在法國以外，P. Kingstone和J. Cole²² 也曾以問卷調查過1979年的2,241位

17 Robert Darnton, *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Paris: Seuil, 1993).

18 James Smith Allen, *Popular French Romanticism: Readers and Books in the 19th Century*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81-88.

19 Rémy Ponton, *Le Champ littéraire de 1865 à 1906 (recrutement des écrivains ; structures des carrières et production des oeuvres)* (doctorat thesis, Paris: Université Paris-V, 1977), 在此感謝馬釗協助取得此論文。

20 Gisèle Sapiro, *La Guerre des écrivains (1940-1953)* (Paris: Fayard, 1999).

21 Bernard Lahire, *La Condition littéraire. double vie des écrivain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22 Paul William Kingston & Jonathan R Cole, *The Wages of Writ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美國作家他們的工作時數及其收入狀況，打破了我們因為龐大的英語文學市場而認為美國作家全都是百萬年薪高收入的刻板印象，事實上美國作家寫作相關的年收入中位數為4,775美金，年收入超過10萬美金的作家僅占4%，而更有高達38%的作家年收入不到2,500美金。在日本方面山內乾史²³則以1859到1960年間出版過個人全集的作家為標準取樣了458名日本近代的文藝菁英（包括小說家、詩人、俳人、評論家和思想家），對他們的出生地、出身階層及學歷進行社會特徵的考察。M.B. Blom²⁴也利用傳記集叢法（*prosopographical data*）針對1940、1955、1970年三個世代曾經寫過長篇小說的美國作家1,048名，分析他們如何從一開始成為作家到成名的社會軌跡，如何因世代不同所面臨的機會與選擇成為作家的策略而有所不同。以上研究者雖然在取樣標準上（即定義作家）和調查方法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建立過的作家資料庫，提供了解研究對象的作家人口的基本社會特徵描寫，以為其論證提供所需要的紮實研究基礎。

三、研究方法

由於本文主旨是要針對台灣戰後作家人口整體圖像進行描述與分析，而不採集體主觀地以某種觀點或史觀評述某個時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及風格形式。但是任何關於作家取樣的社會學研究會遇到作家定義的問題。作家這個社會群體不像其他的職業團體有相對明確的進入門檻的規則或相對完整的同業公會組織，加上文學活動可能都不是他們主要收入的來源，以至於很難劃定整個作家人口總量。這也造成文學界的以文學價值高低決定作家定義和新聞界的以知名度高地決定作家的不同標準之間的混淆。「作家」可能還無法簡單地視之為一種職業，文學活動對大部分作家而可能都不是他們主要職業，但另一方面許多倚賴寫作為生者卻只能被稱為文字工作者，如編輯、編劇、文案等人員。

23 山內乾史，《文芸エリートの研究—その社会的構成と高等教育—》（日本東京：有精堂出版，1995）；山內乾史，〈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文芸エリートの社会学的考察〉，《教育社会学研究》47期（1990），頁125-141。在此感謝吉田光小姐協助閱讀日文資料。

24 M. Bolkéus Blom,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cohort-based inquiry into the US Literary field", *Poetics*, Vol.30 (2002), pp. 311-325.

更何況在某一個時期定義誰才是「作家」還必須回到作家或文學評論者之間如何解決什麼才是合法正當的文學「定義」的衝突。

本文以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以下簡稱「2007台灣作家」）資料庫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它有系統地為每一個作家建立統一體裁的小傳，包括基本資料和文學風格兩部分，前者有每個作家的本名及筆名、生卒年、籍貫及出生地、來台時間、學經歷；後者包括創作的文類，寫作的主要風格特色及獲獎的文學成就，當然還有作品清單。因此，某種意義而言，這可說台灣作家人口普查的資料。截至2007年為止，共收錄了2,638名，本文以戰後作家人口為研究對象，就以全部收錄人數為樣本。由於本研究對象是以1949年戰後活躍於台灣文學場域的作家為主，因此若以出生年計，可能涵蓋了1900年以後出生（少部分甚至更早，如齊如山（1987-1962）），曾出版過一本文學著作的台灣地區作家。²⁵ 這種以在台灣地區出版一本文學著作為定義作家的標準，比較是以外部可客觀衡量的標準，在許多其他這類作家人口調查研究的都可以看得到。²⁶ 儘管如此，這種收錄標準以出版一本「文學」作品為依據非沒有爭議，畢竟關於作家的定義其實是文學場域本身文學正當性追求（the quest for legitimacy）的遊戲之一，其中涉及誰在什麼位置上有什麼的權力賦予誰進入作家行列的門檻問題。同樣是編輯來說，報紙副刊編輯的位置與文學雜誌主編的位置就對誰可以被視為作家會有很大的差異，加上報紙有大報小報，雜誌更因專業化程度不同，對於作家、名家、文學家的主觀的認定會有不同，再加上學院裡的文學研究者所的作家又與上述的主觀認定不同，而更傾向以在文學上有創新者為標準，即文學史上的卓越者。於是，作家的界定本來就是文學界裡話語權力的鬥爭戰場，它和好或壞的作家與作品的價值判斷的

25 「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網頁所示的「收錄原則」如下：一、以長期生活在台灣且從事現代文學創作之作家為主，包括在台灣出生、成長。二、曾在此受教育工作與生活，有作品曾在台灣出版的現居國外之作家。三、其入選基本條件是需有正式出版一本以上的個人作品集，且其作品已獲文學社群之肯定者。四、文學社群肯定之條件：1.獲校園以外的文學獎；2.年度小說、散文及詩被選入者。3.九歌文學大系、聯副三十年大系等大系被選入者。4.文學評論部分要有一定學術地位及研究成果始能認定。「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網頁「收錄原則」。相對於其他國家作家人口的調查，這個標準可說是相當客觀又具公信力。

26 R. Ponton (1977), P.W. Kingston et al. (1986), G. Sapiro (1999), B. Lahire (2006) 也都以出版一本書為作家的標準，同註19,20,21,22。

行使權基本上是一面的兩面。本文所依循的標準以出版一本「文學」著作僅只是在研究上需要選擇此一標準，並不打算說服不同定義作家的觀點。畢竟這是一個外部視角找出一個相對可客觀衡量的讓研究方便的準則，但是文學世界內部可能不是這麼看待。

即便如此，這種以出版過一本「文學」著作的作家定義也不是沒有問題。首先，是文類上，「2007台灣作家」資料庫收錄了大量的「論述」的文類之一（占第三），使得僅出版過評論性文集或文學史論文集的文學研究專家，²⁷ 都被收錄為「作家」，還有一些思想性論著或「學術」著作的思想家也被列為入其中。此外，雖說是台灣作家人口的普查，但是畢竟還是文學小傳，因此僅收錄與文學有關的資訊，關於他們社會出身的背景資料不再其收錄之列，這項資料後來補充添加的。這是根據傳記集叢法而收錄的，一般稱之為傳記集叢法資料庫，此法收集大量的生平資料，建立某個社會群體的集體傳記，透過對他們不同多樣性生命的集體研究，運用初步的計量方法（本文只涉及類別分析和百分比）來描述這個團體的共同特徵。

為了掌握作家群體的社會特性，加以社會人口學的描述，我們還必在「2007台灣作家」資料內容轉化成結構化的資料以便進行簡單的統計計算，方能說明他們的性別、族群（省籍）、教育狀況、社會階級（以其職業為代表）及社會流動（以其社會出身，即父親職業到本人職業的移動軌跡為代表）等面向。²⁸ 本文著重在作家做為一個社會群體集體特徵的描述，因此不會針對某一個作家、某一類或某一派進行評述。若文中援引某些個別作家（特別是較不知名者）主要是為了說明整體的社會特徵。

四、作家人口的社會型態學

前述台灣文化景緻與政治環境和社會結構相關密切。如何解釋在台灣文學

27 由於將評論類著作納入「文學作品」之類，使得部分文學研究學者都變作了「作家」。這些學者專家研究範圍涵蓋很廣，從傳統中國文學到現代文學，從中國／台灣文學到英美文學（只要以中文出版過），包括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論著，有些甚至還只有政論性文章。有些入選作家的著作看似不見得都那麼「文學」，這的確上在分類工作上相當困難。

28 為此，我們也在原有的「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庫上，另外收集了父親職業與文學派系的相關資料。

與社會之間這種緊密又糾結的關係，常見文學史的作法是將作家生平及作品內容與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並列紛陳後彼此之間就好像自動有直接的影響一樣，或者哲思式文藝社會學研究，從作品的內容分析著手將文學（文類、風格和意識表述，或某種文學意義缺席或逃避）視為當時社會與政治的反映，但無法具體指出如何運作。本文從文學社會學的調查方法出發，嘗試解釋文學史勾勒各個時期的文學風貌，透過對作家人口的社會型態學分析，更能有依據地解釋社會結構變遷與文學現象之間的關係。探究各個時期的文學風貌如何與作家人口的組成結構有直接影響，本文正嘗試從作家人口及其作品的統計描述，探測在戰後台灣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從作家人口結構的變化資料看來，台灣文學場域內部生態的變化與文學以外的政治社會結構幾乎直接相關。1949年國共內戰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大批軍民改變了台灣的社會結構，也因此改變了文化菁英的組成結構以及台灣文化風貌，作家人口也徹底改變。日治時期位居殖民社會中上層被支配占置的台籍社會菁英，他們對光復後的美好憧憬，回歸祖國後能主宰自己命運，成為支配整個台灣社會上層位置的中堅力量，一夕之間幻滅。尤其以日語為上乘語言的文化菁英，禁止使用日語和強制推行國語運動，而變成失語的一代。二二八事件更直接衝擊不少台籍菁英，不只禁止發聲，更因強烈的暴力手段，淨空上層的社會空間，其中最劇烈者莫過政治文教方面的文化菁英。旋即，國共戰爭失利，120萬軍民遷台，就社會空間位置而言，主要占居了大部分文化教育，以及軍事行政的上層的位置，以及全部國營事業的經濟生產單位的中上層主管，形成所謂「軍公教人員以外省人多」的情況。戰後台灣如此巨大的社會結構變化，徹底改變了台灣作家人口的組成，當然也決定了文學的樣態。若說單調重複的反共／戰鬥文藝是國家文藝的文學生產機制生產出來的不具市場價值，也不在乎讀者是否閱讀的文學產品，那麼此一生產機制卻更造就了眾多的以外省為主的作家人口。隨著反共文學的退潮與部分遷移軍人的轉職後，這些戰後培養出來的戰後作家成為創造50-60年代的生力軍，他們都在同樣在白色恐怖下，被極度政治檢禁所壓迫的僅有文學空間下，各自選擇不同的策略進行文學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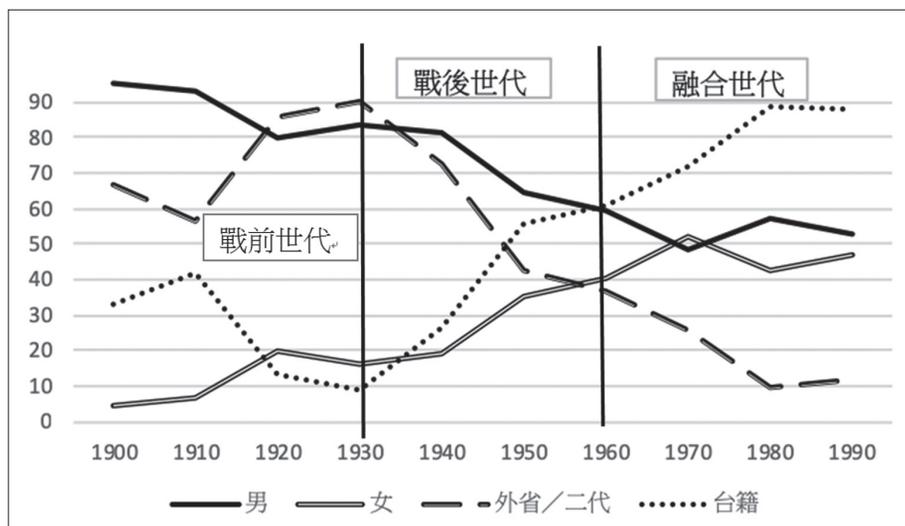


圖1 台灣作家人口的世代、性別與省籍比例

眾所皆知台灣作家人口中外省比例遠大於台籍。雖然在數據上本省與外省及其二代作家的比例看似相當（49%：48%），這雖然不符合文壇都外省人天下的刻板印象，但若考慮到兩者人口比例的差距（85%：15%），外省及其二代作家的比例相對而言還是很高。上述刻板印象尤其1980年前的文壇尤其真確。為了行文方便，我們將作家出生年以10年區分為一個「世代」，首先將1930年以前出生的4個10年世代合稱「戰前世代」，他們或是戰前已成名，或是遷台後成為作家及日治時期本省籍以日文或中文創作的作家。這也符合圖1中外省作家急遽增加的幾個世代；其次以1930到1960年出生的3個10年世代為「戰後世代」，他們有些雖在戰前出生但都未成年，卻共同在戰後台灣受不同程度的中高等教育或完全的國民教育，共同的國語和黨國民族主義思想教育是他們的特徵。戰後世代的1930-1939出生的外省作家不再成長反而開始下降，雖然比例上還是維持多數，而本省籍作家的比例開始一路成長，兩者在出生年1960前後發生交替變化，本省作家人數上開始多於外省，雖然未達人口的省籍比例。最後是1960年以後出生的3個10年為「融合世代」，他們成長於威權較寬鬆的時代，也是經濟成長快速的時代，不論在作家省籍差異回歸人口省籍的比例，還有性別的差異也在1970-1979世代趨於平等（見圖1）。這是以作家的出生年做為世代的區分，他們在文壇活躍的時間約在出生年30-40年後（台灣

作家出版第一本著作的平均齡為34.55歲）。²⁹

在戰前世代中出生在1910年以前的作家，台籍者文學活動還可以日、中文創作，省籍差距不如至那麼懸殊。之後兩個世代作家省籍差異最遽，主要創作的年代落於1950-197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間，雖然，所有的文學家者都冒著生命的危險在創作，兩個省籍成為作家的客觀機會不相同，遷台或外省作家在國家或軍中文藝體制下鼓勵大量地出版第一本書取得作家的「資格」，進而占有文學場域的不同位置（從主導到邊緣都有），而省籍作家則相反面臨從日語轉換成中文的失語世代。1930-1939年出生的世代在戰前出生，多少年來台並接受中高等教育，部分在完成學業後轉往北美發展的菁英。他們不論留台或旅居海外，一直以中文創作在文學場域占有一席之地，也多具有現代主義的色彩。外省作家還是在此世代居絕大多數的比例（72%），但台籍作家也慢慢因中高等教育，漸能掌握語言而開始創作（26%）。因此，直到文學世代1940年出生以前（即1980年以前）的文壇都是外省人支配的天下。

但目前沒有任何文獻可告訴我們外省作家支配主要文學場域的現象持續到何時？台灣文化菁英的省籍差異在文學場域的表現，是否與其他社會群體一樣隨著國語能力和教育的普及後省籍在教育成就上的表現上會漸漸消失呢？何時消失？據圖1可發現直到1940-1949的戰後世代末期，本省作家人口的比例才會開始超越外省。若將作家出版第一本書取得作家資格的平均年齡設定30-40歲。1940-1949年世代也符合吻合鄉土文學作家的崛起的七〇至八〇年代。第一批受過較完整的國語文教育的本省作家開始出頭，他們不只在語文能力足以從事文學創作，並且也在文學技巧上追求突破，最重要是他們在數量上也急遽增加，並在下一個世代1950-1959年超越外省及其二代作家。但正如前述若依人口省籍比例論，即使本省作家人數多於外省及其二代，這個比例還是不成比例的高。戰後出生的幾個世代，即1930-1960年間出生的作家，都可發現外省二代還是在成為作家群體在統計上表現出優勢，直到1960-1979年出生作家的

29 根據每個作家出版第一本著作的平均年齡自行計算而得。審查之一提醒筆者，1990年代台灣地方文學大量鼓勵寫作的現象，催生了許多教師、記者因為地方文學獎和地方作家作品集的出版而成為作家。值得進一步分析和討論，應另文處理，在此謹謝意見。

世代才相對地近趨外省籍的人口比例，他們文學創作活躍的年代約為1990以後的事。也在這個世代後，這種省籍做為社會分類的效用就越來越低，省籍的區分也越來越轉化成為群族認同的意義。

從圖1作家人口的省籍比例歷史消長可見到文化菁英群體的土著化，兩者的比例從外省占絕對多數的高度不均等分布，到後期越來越趨近於總人口的省籍比例。這一方面主要是戰後的不同程度的國語教育，使本省青年漸具相同的文化能力，一起競逐文學場域，另一方面也是外省移民與本省家庭的通婚或交往後，省籍做為社會分類的架構越來越無效。最後，在本文1960後出生的「融合世代」（即1990後的文壇），作家群體的省籍比例達符合總人口比例的均衡。然而，圖1也可發現外省籍在作家人口的長期支配現象持續很長時間，從1910到1970年的文學世代都是如此，說明外省菁英在此時間有再複製的現象，即不只是遷台和外省作家的比例高，就連外省二代的比例依舊偏高，這與其他研究的結果相仿，即同時期外省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成就較本省高。³⁰ 外省二代作家比例偏高可能只是整個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的反映而已。

此外，教育普及卻很明顯地作用在作家人口性別的均等化。儘管全部作家的性別差異很大，男性占2/3，女性僅占1/3。但從圖1看來，性別差距主要發生在戰前世代、戰後世代後漸趨緩和，男女均等要等到1960以後出生的融合世代才比較能夠真正實現。此性別差距的平等化很明顯地應該是與他們在不同時代受教育的機會密切相關。戰前世代不論台籍或外省，女性受教育的機會都比男性低，雖然戰前兩地教育制度不同，但只有都市的有錢或有勢家族較有機會獲得教育之現象。故不只女性偏低，同時女性作家許多是出身上層社會的家族。戰後世代經過了失語的年代後，很快地接受了國語普及化運動，尤其國民教育及九年國民教育後，國語識字率很快增加並普及。普及均等的教育機會使

30 幾個社會學家的研究論文都指出相同的現象，只不過原因解釋不同，見蔡淑鈴、瞿海源，〈台灣教育階層化的變遷〉《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卷1期（1992），頁98-118；王宏仁，〈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階級結構與流動初探〉，《台灣社會研究》36期（1999.12），頁1-35；駱明慶，〈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29卷2期（2001.06），頁117-152；范雲、張晉芬，〈再探台灣高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9期（2010.09），頁259-290；吳乃德，〈高等教育成就的族群差異：學費補貼、職業情境、與世代差異〉《臺灣社會學刊》52期（2013.06），頁1-30。

得戰後出生的各個世代男女比例漸趨平等。事實上，作家這個「職業」（與其說是「職業」不如說是身分）比起其他職業對性別的限制與影響可能要更小的，因為它沒有任何性別相關的限制。因此作家性別差異不能直接用父權社會的作用來解釋，因為性別不平等的社會意識並無法直接運作於哪一個性別是否成為一個作家。作家人口的性別差異歷史必須從受教育的機會來說明，因為作家的能力終究取決於文化能力，而文化能力的取得隨著不同世代所處教育制度帶來的機會有直接相關。也就是說，作家的性別差異必須從不同世代女性受教育的機會來解釋。因此，這可以透過不同世代作家的性別差異變化說明。但這可能都只是作家人口中男人比例均等的必要條件，就像吳爾芙（Virginia Woolf）所言女人成為作家必須要有自己的房間。不論是有形的「寫作空間」（通常以自己的書房為代表）則需要經濟條件允許，無形的專屬於自己的文學空間更需要社會條件支持（如女性能夠擺脫沉重的家務勞動時間，並獲得家人的支持）。³¹

五、教育門檻

關於作家的才華，我們一直抱持某種矛盾的認可想像：一方面類似於藝術世界的天才論，文學世界裡也盛行「才子論」的信仰，即人們普遍相信要有才華才能成為作家，某種與生俱來的文字駕馭能力，出口成章地精妙掌握文學審美判斷的稟賦。另一方面：為成為作家一定要有才華，就像所有藝術家一樣相信著天才論，對文學或藝術天才無限崇拜；但另一方面也默認教育所帶來的語言與文化能力是成為作家的必要條件。當我們以較科學的「證據」說明成為作家的條件重要的是高教育水準時，人們又會說「這有什麼好說的，大家早就知道了！」於是，社會上普遍對文學或藝術天才有無限崇拜與信仰，和務實地知道成為作家、藝術家的條件往往必須受過高等教育之間雙重認可似乎並不自覺矛盾。或許大家都知道要成為文化人的菁英都必須受過高等教育，但人們

31 此處無法處理女性成為作家的社會可能性條件，除了教育條件外，還必須從不同世代女性作家的職業活動，參與文學活動的機會，文學出版市場的社會空間，乃至於讀者文學品味的性別需求等一一考察。本文限於篇幅僅指出作家人口性別差異現象，還須進一步另闢專文深入解釋。

更愛文采才子。這可能涉及兩種不同的「作家」，才子論的作家或文學史上劃時代的作家也許真的需要才華，但此才華更需要後世持續不斷的認可。而這裡談的更多時候是一般作家，因為只要被文學社群認可的作家出過一本文學書即是。反而在平庸作家身上，可以看出教育做為台灣作家門檻效應有多大？

一般而言對作家才華，大致上會歸因於三個來源：天才論、家庭（文學世家）或後天教育。事實上，在台灣作家人口中，儘管文學世家（父子輩都是作家）常傳為美談，學術或文化界子女成為作家者也常有耳聞，但出身文化世家的比例在台灣社會其實相當低，原因無他，只因在台灣長期穩定幾代的世族為數不多；至於個人才華的天才論向來都是文學世界對成為作家條件的普遍信仰；但是事實上證明成為台灣作家的真正條件，既不是家庭因素，也不是個人才華，很明確是教育條件，尤其是語言文科的教育。教育的門檻也相當程度地決定了，台灣作家在省籍、性別以及世代上的分布樣態。

根據「2007台灣作家」資料庫中學歷加以結構化並統計，台灣作家幾乎都具有大學以上的學歷文憑（91%），雖然不是受過高教育才可能成為作家，但僅有高中以下者比例不高（約僅9%），亦即沒有大學文憑能夠成為作家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九。高學歷成為這類文化菁英社會群體的重要特徵，在作家人口身上尤其明顯。³² 若以受教年限計算，台灣作家平均受教17.1年事實上已經高於大學畢業（16年）的程度。³³ 這也因為不同世代、省籍和性別有很顯著的不同，這些變項的差異正是文學外部世界的社會結構與政治局勢變化影響所造成。從表1看來，平均受教年限戰前世代與戰後世代相差幾近2年（17.4 > 15.4），主要是戰前世代多經歷戰亂失學。以戰前世代的省籍差異上可看出外省與本省相距2.6年的受教年限，充分說明日本殖民統治限制高等教育發展下，使得本省籍作家普遍處於教育劣勢狀況。此外，戰前世代女性的受教年限反而略高於男性（15.8 > 15.4），一方面可從男性因戰爭從軍來解釋；另一方面也可從能夠成為作家的女性大多都出身上層有能力培養子女受教的家庭（尤其是1900年以前的女性作家）。

32 我們沒有其他類文化菁英的資料，但估計藝術家或表演類的文化菁英平均學歷會較作家低。

33 即使是戰前世代多因戰亂失學者，四個世代的平均也有15.4年，將近大學程度。

表1 作家的教育年限

世代／變項	男	女	外省／二代	本省	平均教育年限
1900以前	15.6	17.0	17.1	13.4	15.7
1900-1909	15.1	15.6	16.4	13.8	15.1
1910-1919	15.5	16.0	15.9	13.5	15.6
1920-1929	15.5	14.6	15.5	13.9	15.3
戰前世代	15.4	15.8	16.2	13.6	15.4
1930-1939	17.1	15.7	17.2	15.7	16.8
1940-1949	18.0	17.0	17.9	17.2	17.6
1950-1959	17.6	17.7	18.2	17.3	17.7
戰後世代	17.6	16.8	17.8	16.8	17.4
1960-1969	17.7	17.8	17.4	17.8	17.8
1970-1979	18.4	17.8	17.8	18.2	18.1
1980-1989	15.8	18.3	16.0	17.1	17.0
融合世代	17.3	17.9	17.1	17.7	17.6

戰後世代是普遍受良好高等教育的3個作家世代。一方面父輩因戰前普遍失學或沒有受過好的教育，期望其子女在戰後受益於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戰後台灣的教育體系非常有效率地培養了大量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才，直接受益的就是作家人口受教年限延長許多（1940-1949年出生的作家平均受教17.6年），擁有大學以上的文憑。台灣戰後教育對各個群體成為作家的機會不盡相同：若以平均受教年限17.1為基準，首先，擁有高於總平均值1930-1939年出生的外省和男性作家（表1斜體字者），這個世代的作家正是戰後60年代現代主義的主力作家人口；其次，下一個世代（1940-1949）的本省籍男性作家躍

升上台灣文壇成為鄉土文學運動骨幹成員。³⁴至此，我們或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台灣兩次大的文學運動，它們不只是文學內部的流派與風格之間的競爭，也是不同社會群體的文化菁英在獲得某種程度的高等教育機會後，依持各自生活習慣（如戰前上海、戰後台北或台灣的鄉土經驗）在文學場域標示各自的文學語言與文字風格，展示自己的創作理念。於是，兩個文學運動的生成可以從兩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利用文學語言美化其生活模式的表述：前者類似文學上「為藝術而藝術」波西米亞式的前衛性放逐，後者則是受國語教育後第一批新興本省作家，將他們的生活經驗轉化成文學作品。兩個台灣的文學運動是兩個戰後台灣文化菁英崛起於文學場域前後競爭關係的結果。從作家人口的社會型態學分析，尤其作家教育門檻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理解戰後台灣的文學運動。

雖然文憑不是成為作家的正式條件，且作家之間比起其他社會職業類別，更不會以學歷文憑示人。高中以下低文憑者成為作家時有所聞，但本研究顯示，高中以下低文憑者成為作家的機會較少，並隨著時代演進而逐漸減少，戰前世代還有14%、戰後世代8%，到融合世代僅4%。不止如此，隨著台灣高等教育幾次的擴張，³⁵整個新世代人口教育水準普遍上升，成為作家（雖只須出一書文學類書）的教育條件卻越來越高。就連只擁有大學文憑的作家的比例也都在減少中，相反的擁有碩博士文憑的作家卻不斷增加，碩士文憑在融合世代（1960-1989）甚至占1/3。因此，若以幾個大世代而論，戰後世代擁有碩博士文憑的作家就占了大約一半，融合世代作家擁有碩博士文憑者更高達7成，若將融合世代加上擁有大專文憑的作家高達93%。故受過大專以上的高等教育幾乎是1990年代後文學創作的必要條件。個人才華的確是成為著名作家的關鍵因素，但是在1990年後若沒有大學以上高等教育的能力，就算有才華大概也難以發揮而不被認可與賞識。

至於大學學歷以上的學科分布，僅以有註記者而言，大致呈現以文科為

34 當然被標示為現代主義或鄉土文學的作家都橫跨三個10年世代，但多數的主要成員在現代主義是1930-1939年出生的世代，而鄉土文學則是1940-1949年出生的世代。

35 從1980年代技職院校的成立到1990年代開始的普遍新設大學或大學升格，也開設了許多碩博士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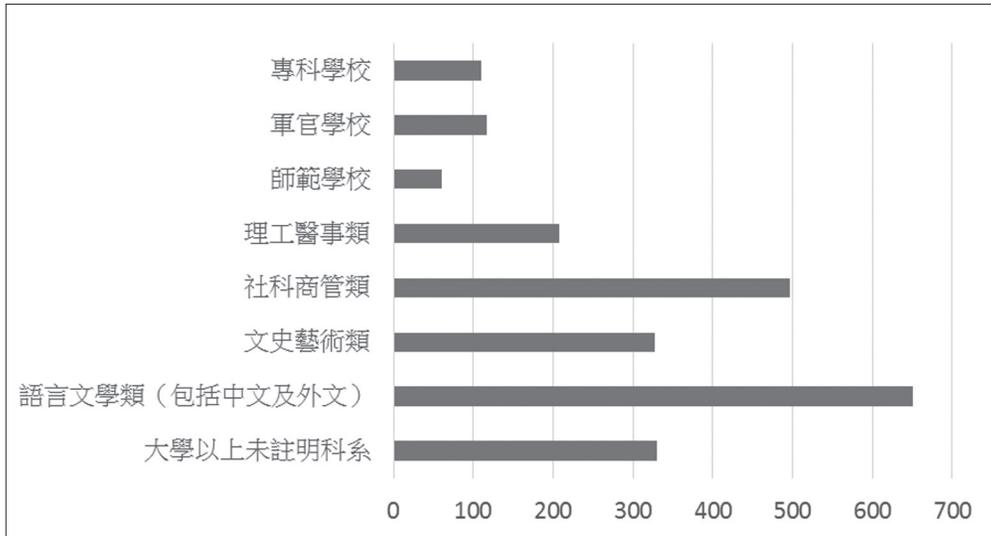


圖2 作家最高學歷的學科類別

中心，越遠離的學科成為作家的機會越小。語言文學類（包括中文及外文相關系所）最多、其次社科商管類、文史藝術類、理工醫事類。此結果不意外，尤其將學科的分類經過特殊設計後，³⁶ 其結果還呈現如此分布就更確定語言和文學教育對培養作家的可能性。但也不必過度誇大，因為畢業於文史藝術和社科商管類學科的作家為數也不少，甚至與語言文學類的作家相距不遠。再說這種以文科為主向外遞減的學科分布主要集中在集中在大學學歷，到了碩士和博士文憑範疇時，語言文學類學歷不會增加成為作家的機會，因為到碩博程度時，比例最高的並非語言文學類，而是文史藝術類學科。事實上，上述在大學以上學科分布語言文學類最多，主要是大學學歷部分的貢獻，碩博士程度反而沒有那麼高。這說明，成為台灣作家的教育條件，中文與外文等文科高學歷雖然有助於提高成為作家的機會，但僅止於大學程度。³⁷ 其中原因不難理解，凡從教育獲得的文化資本，大學程度所習得的多屬於「文化養成」教育的內容，即使有專業知識也不如碩士以上那麼往學術研究發展。而碩博士程度所習的內容則大量

36 我們特別放大文科比例，即比起理工醫事範圍很大，語言文學只有中文及外文的相關系所。這是為了要更精確地量測作家這個社會群體。

37 關於文科碩博士文憑人數的計算還須考量「2007台灣作家」資料庫將出版過文學研究的著作者計算進去，這使得中文或外文博士文憑的大學教授研究並出版過台灣文學研究者，都被計算成為「台灣作家」，進而大量提高了語言文學類博碩士文憑之人數。

專業知識，以訓練成為研究人員為主，不再只是文化養成教育。是故，大學文科所學的文化養成內容，就文學創作而言，可能比培養研究人才的碩博士的知識積累養成貢獻更大。亦即，若高等教育所獲得的文化資本分成「文化養成」與「知識累積」兩部分，成為作家的教育條件可能不在於專業知識積累的碩博訓練，而在語言文學類為主修的大學程度文化養成教育。

六、社會出身

這個調查研究的重點之一即考察以台灣作家為代表的文化菁英的社會出身，以便釐清近百年來台灣文化菁英的社會軌跡，他們的文化資本如何傳承？家族力量或社會出身是否在文化菁英的形成中構成重要的社會條件？Bourdieu曾經探討法國社會的「文化貴族」現象，指探討文化資本可以像貴族頭銜一樣，被幾個世代的家族之間成員繼承者，這尤其在布爾喬亞階級特別明顯。這些持有高度文化資本的文化人往往一大部分出身自上層社會的家族，共享著所謂「布爾喬亞文化」。事實上這種文化貴族的現象，根據Ch. Charle再利用 R. Ponton的調查資料處理比較後發現，在19世紀後半到法國的文壇40%左右的作家社會出身不是來自於私人部門，就是文教方面的中上層布爾喬亞家庭，而根據Sapiro的統計，二戰期間的法國作家人口也有一半以上來自上述的布爾喬亞家庭。³⁸ 藉著此問題，我們也好奇同樣屬於文化菁英的作家，他們大部分來自那一個社會階層？「文化貴族」的現象是否也出現在台灣社會，即他們大部分來自一些上層的支配階級，這不只是來自於作家或藝術家的文化家族，也是指來自其他部門的上層家族，如醫師等自由業、高級行政或軍事管理階層或工商業主的大老闆。總之，藉此探討作家，這群文學類文化菁英的社會流動問題。

由於社會出身資訊（以父親職業及家庭背景測量）一方面不在「2007台灣作家」資料庫收錄的範疇，我們必須另外透過其他管道蒐集。另一方面，這類關於個人出身、家庭背景和父親職業等資訊已涉及個人隱私，並非人人都願意

38 Gisèle Sapiro, "Mesure de la littérature : Approches soci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Histoire & Mesure* Vol.23, No.2 (2008), pp. 35-68.

透露。因此我們須劃定一個倫理界限，即僅以公開資訊為搜集對象，如網絡資料、傳記、百科全書、文學字典等。在公開資訊為限的條件下，本研究清查了所有台灣作家的父親或家庭背景資料，共取得884筆有關社會出身的描述，而且這些資訊往往不是輕描淡寫的帶過，就是殘缺不全又模糊（如出身自農家、家裡務農，父親經商等）。884筆只約總數的1/3左右，其餘都查不到父親職業或家庭背景資訊。因此，以下的討論乃是針對1/3有父親相關資料的，無法推論到全部作家的社會出身狀況。

此外，關於以父親職業或家庭背景來衡量的社會出身，是以父輩的家庭或職業狀況為進行分類與計算。作家父輩所處年代的職業結構和生存的社會條件與我們所處的社會狀況並不相同。我們在研究作家的父親職業時，必須要能夠考量到台灣1980年代以前的職業結構與社會條件，包括戰前的中國和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因此，本文不採社會學慣用的《中華民國職業分類》或「職業聲望與社會地位量表」，這些分類法既無法反映實質的社會變遷，也無法測量戰前社會的職業狀況。更無法掌握在同一分類名詞可能因為時代的不同，其社會地位有很大的差異，例如戰前台灣的「糖廠工人」可能是在當時社會身分相當於中上者；而戰前大陸的教師或小學校長可能在當時職業分化不多的情況下已是當地社會的中等階級。因而需建立一套更貼近二戰前後文化人父親職業的分類架構。我們根據作家生平傳記等資料對其父親職業的具體描述，將他們關於父親職業或家庭背景的描述一一紀錄下來再加以分類。

根據傳記生平具體描述父親職業而建立的職業分類表，首先必須考量歷史變化，即台灣作家來自本省與外省兩個群體，他們父親分處兩個不同的社會：日治時期的台灣和戰前的中國社會，兩個社會職業的分布情形並不相同。所幸，兩個社會都還處在相對傳統的農業社會，初步的現代化主要集中在公部門和現代軍隊及部分起步的都市化帶來的商業部門。作家生平傳記的表述裡，我們觀察第一、傳統農、工、商的分類依舊有效，加上在職業分化不多的情況下，現代國家所建立公教部門都在戰前中國會顯得特別突出，但是殖民台灣，這部分的職位對台灣人開放得就少很多。這種殖民社會直接影響戰後的社會結構，由於受過高等教育且擅長中國語的台籍人士較少，加上1949內戰後的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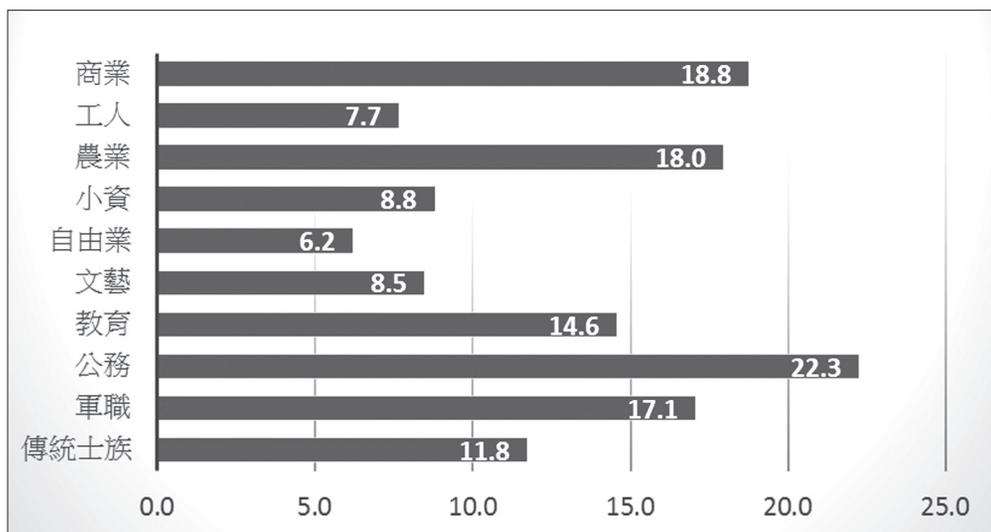


圖3 作家的父親職業類別（人次比例）

部門的遷台效應，使得在職業分布上外省籍多集中在軍公教，而本省籍則集中在農工商等部門。第二、傳統士族（地方望族或文化世族）³⁹的家族力量對文化菁英的形成在戰前的社會依然有關鍵性的角色。對於子女的人生規劃，不管是教育或就業，特別是文化的養成，大家族的力量有時大於父親的角色，或因戰亂父親長年滯留外地，家族對於文化延續和子女教育都扮演比現代社會更重要的角色。於是維持文化菁英的社會地位，除了父親職業，也要考量家庭背景。第三、醫生（包括中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自由業往往是現代化社會發展初期軍公教部門以外的第一批社會菁英，他們往往在工業化之前即已存在，也是傳統地主菁英的下一代在現代社會維持菁英地位最常見的轉換策略，尤其是在台灣日治時期扭曲的高等教育，但他們人數不多。第四、這所謂「小資」包括傳統社會的小地主、富裕家庭以及現代社會中的工程師／技術員人員（包括糖廠技師／工）、私人企業僱員、牧師／神父等，俗稱的小資產階級。第五、父親職業並非一生不變，可能經歷過幾種不同的職業，亦可能同時兼職兩種以上或副業。而且在多個生涯經歷的表述中，我們也無法判斷何者

39 傳統士族分兩類：地方望族與文化世族，前者以執有土地作為地方權力的來源，後者則是以家族成員曾經具有學科功名。但兩者可能都擁有大量的土地，故文化世族往往會在兩個類別被重覆計算。

是主業，又持續多久時間。因此，為貼近生平傳記表述的父親職業，我們採用多重紀錄法，將提到職業經歷都列上後，加以人次統計，而非該職業類別的人數，但總體而言至少可以得知1/3作家人口的父親職業狀況。

圖3是有父親職業資料者（N=884），依職業大類的人次百分比比例圖。社會出身自公部門最多約22.3%，其次令人驚訝的是來自商業部門（家裡從商或做大小生意者）和農業部門（家裡務農或農村家庭）緊接在後各占18.8和18%，其實相距不大。再次父親從事教職和軍職者依次有14.6%和17.1%。然後，作家出身自傳統士族者在總體上有一定的比例11.8%，但卻並沒有關鍵性的重要性。這說明文學場域上的社會流動，即父輩所從事職業類別之間，其子輩成為作家的可能性是相當均等，父親在農業和商業部門任職的比例並不比自身自傳統士族的作家比例小。⁴⁰ 在台灣農家和商販的小孩成為作家可能性不小於來自傳統菁英的文化世族或地方望族。倒是「繼承衣鉢」在文學場域不多，即父親是藝術家、作家或雜誌編輯等文化生產者，而其子女又成為作家的情形並不常見，約只有8.5%而已。然而若考慮作家的父親所處的時代1900-1970年間，不論在台灣或戰前的中國皆是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型與現代國家正在建立的磨合時代，現代國家在軍公教部門都極為快速的擴張，但社會型態卻尚未脫離農業社會轉變成工商社會，因此整個社會的就業人口上在軍公教部門較多（軍人職業多也與20世紀前半中國戰亂頻繁有關），而工商部門較少的情形。因此，若我們將軍公教部門合併計算，約莫一半（54%）作家的社會出身來自於這三種部門，而形成台灣文化菁英的主要來源。當然，這與省籍結構有密切關係，一如前述作家的養成又與其文化和語文能力有直接的關係，出身外省家庭的作家自然就多，而外省移民人口主要都集中在這三種部門，因此以軍公教為主的台灣作家社會出身和他們的省籍在職業結構分布幾乎是一體的兩面。

若我們再進步分析戰後台灣作家的父親職業的省籍分布（見圖4）就很明顯可發現兩極化的情形：外省及其二代都來自軍公教家庭，而本省作家則多來

40 當然若對比全部勞動人口的職業分布可能這種均等只不過在類別上均等，雖然沒有戰前的較精確的人口職業統計，但可以想像大量的農業人口，而少部分的地主家族，加上為數不多的軍公教人口，相對於總勞動人口的職業分布而言還是不均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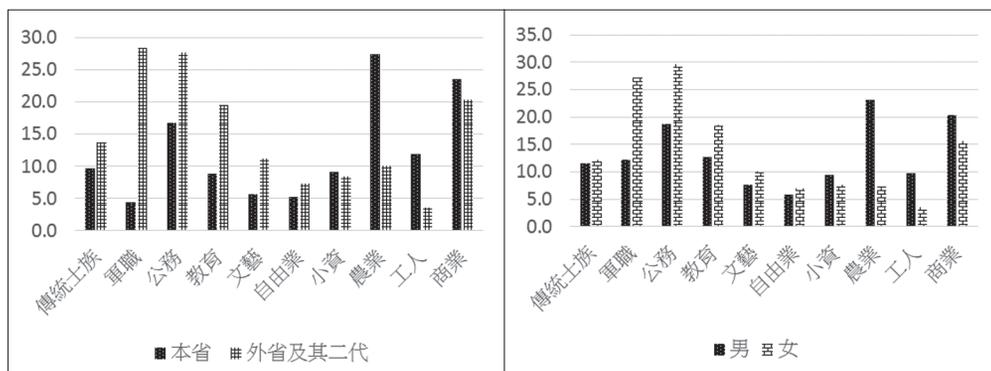


圖4 作家父親職業類別與省籍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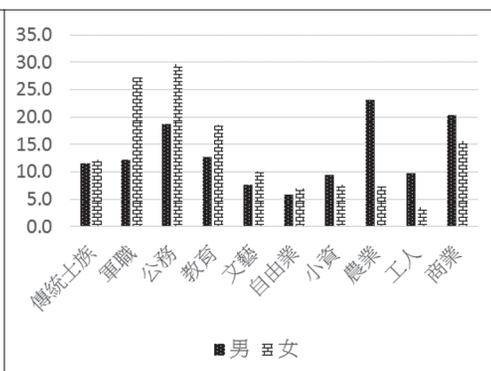


圖5 作家父親職業類別與性別的比例

自農工商家庭。外省及其二代作家父親職業主要分布以軍公教部門為約大部分約七成五，若加上文藝生產者幾乎達到八成六，相對而言社會出身於傳統土族或自由業者的外省作家卻不是太多約僅占二成而已；但是本省作家的社會出身多出自農工商等部門約占六成三，而農家出身的作家就位本省籍的27%。而也只有社會出身來自農、商、工這三種部門的本省籍作家比例高過外省及其二代。這種兩極化的不同省籍作家的父親職業分布與他們父輩所處時代的職業結構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有密切相關，畢竟看似與世無爭的文學世界還是在整個社會裡，其成員的社會出身還是來自於整個社會空間。

至於不同性別作家社會出身也呈現類似於省籍的分布（見圖5）。女性作家父親職業的類別分布與外省／二代作家父親職業分布幾乎一致，只不過是在農工部門比例有差別（至少在走勢上是相近）。女性作家父親職業一樣較集中在軍公教部門，這很明顯的說明女性成為作家的諸多社會條件中，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門者能提供其子女較好的教育機會，因此社會出身來自這些部門的女性作家就較多。同理女性作家出身文藝、商業和自由業的比例也相對而言高一些，尤其是出身軍人家庭的女性作家比例甚至高過男性一倍以上。男性作家出身比較集中在公、農、商，占男性作家的六成二，其實來自軍人和公務家庭也不少。由於作家性別男性多於女性，女性成為作家的機會在各種社會出身都比男性困難。但若僅看女性作家的父親職業結構分布可以發現，出身自某些職業類別家庭背景比較容易出現女性作家，如軍人家庭、公務員、教育部門和自由業，加上傳統土族都比出身自農工商的容易出現女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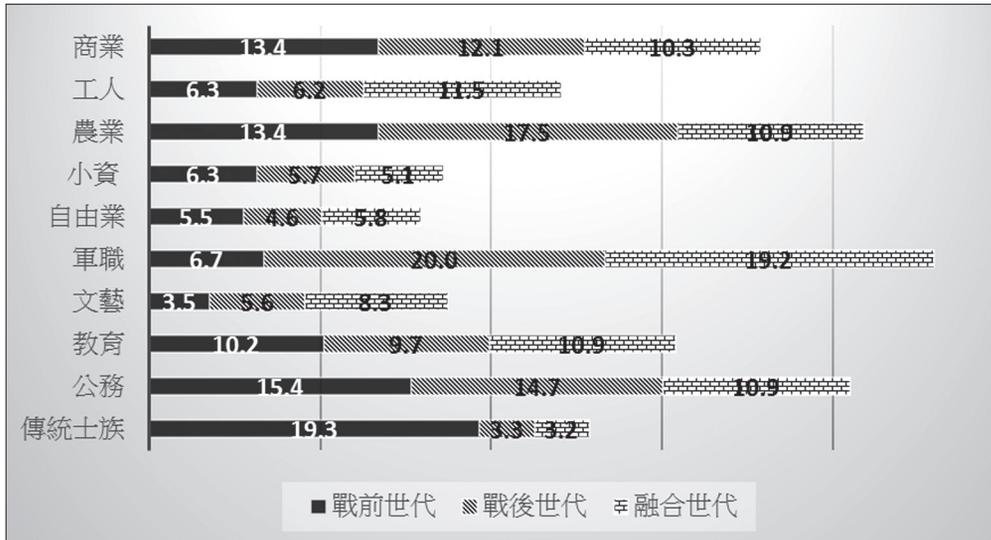


圖6 作家世代的父親職業類別

若從不同世代作家父親職業分布來考察，圖6顯示不同世代作家的社會出身會有不同的家庭背景與父親職業的分布。其中出身教師家庭（9-11%）、父親從商（10.3-13.4%）或小資家庭（5.1-6.3%），以及父親從事自由業（4.6-5.8%）台灣作家在幾個世代上都變化不大。倒是傳統土族出身的作家人數隨著時間而不斷式微，而出身公務家庭的作家也在融合世代後明顯地減少（15.4到10.9%）；出身軍人家庭的作家很明顯地隨時間演進所占的比例就越高，從戰前世代不到6.7%，到戰後世代19-20%之間，換句話說他們幾乎取代了沒落的傳統土族的社會出身，超越公教部門成為台灣文化菁英的社會出身來源。出身農家的作家世代起伏比較大，從戰前世代的13.4%經歷了戰後世代17.5%的高峰後，在融合世代降至10.9%。若進一步細察每10年出身農家的作家變化，其實可以發現大致有兩個高峰：1910年以前出生的作家來自農家約14%，另一高峰是出生於1940-1949的作家世代來自務農家庭也有23%之間。兩次高峰可能都與現代國家的教育擴張，使農村子弟在社會流動上獲益，第一個高峰主要是從科舉改為新式教育（或接受日式教育），第二次高峰則是在戰後台灣國民教育的普及，使得本省農家子弟透過教育學習晉升為社會菁英，其中部分成為作家的文化菁英。而農家出身低潮的作家世代也吻合幼年戰亂與政權變替的時局，不利農家子弟成為作家。反倒是父親原本就從事文藝生產活動，其子輩最

後也成為作家的比例一直都不高（在8.3%以下），打破我們對作家藝術家子女易成為作家的印象，然而最近的融合世代中尤其是1970、1980年代出生的卻有比較明顯的趨勢，即他們父親職業從事文化事業相關行業者，其子女反而變成作家的機會比以往任何世代都高很多。最後必須提醒讀者，由於最後兩個世代即1970和1980年代出生作家人數少，有父親職業紀錄的更少（僅53人），很難據此少量的樣本說明這兩個世代的種種社會型態學現象，其變化趨勢必須更長的時間才能較精確的觀察。

表2 作家父親職業的社經地位

社經地位	類別	職業細項	人次	男	女	本省	外省／二代	華僑
高	傳統士族	文化士族（家族成員曾是有科舉功名者）	414	248	166	136	273	5
	傳統士族	地主（地方望族或大地主）						
	公務	省級以上官員／總督府行政人						
	公務	黨政人員（各級黨政人員）						
	公務	國營事業體（各級幹部與職員）						
	教育	教師（中學以上，包括中學校長，學堂創辦人）						
	軍職	軍官（校級以上）						
	文藝	文化生產者（作家，劇作家、詩人）						
	文藝	文化生產者（畫家、藝術家）						
	文藝	文化事業者（任職於報紙：編輯或記者）						
	自由業	學者專家						
	自由業	醫生（包括漢醫）						
	自由業	律師和相關法律人員、建築師等						
	商業	工商業主或實業家						

社經地位	類別	職業細項	人次	男	女	本省	外省／二代	華僑
中	公務	省級以下官員／殖民地僱員：庄長、街長、保正	368	243	125	162	201	5
	公務	中學以下（包括小學校長，含國小創辦人）						
	公務	教書（私塾、兼任教師、補習班教師及負責人）						
	軍職	軍官及軍人（校級以下）						
	小資	小地主（富農，自耕農）						
	小資	富裕家庭						
	小資	工程師／技術員（包括糖廠技術員和工人）						
	小資	私人企業僱員						
	小資	牧師／神父，神職人員						
商業	小商人（包括攤販）							
低	農業	農村家庭	217	186	31	151	62	4
	農業	農民（務農，包括糖廠契作農民，佃農）						
	農業	家境貧寒，貧農／父早逝						
	工人	工人						
	工人	工匠						
	其他	其他術士						
	N=884							

儘管，將父親職業以社會經濟地位區分為高中低多少帶有理論的任意性。因為不同時代職業結構的分布可能影響職業結構位置上人的社經地位，尤其考慮到社會境遷後同一職業的社經地位可能會有所變化，如準戰時的戍衛社會裡軍人的地位很明顯的會提高。但不管如何，父親職業的社經地位的高中低的區分不失為理解作家社會出身的尺度之一。特別是涉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比較研究時，不同社會的職業結構也會因在不同時期有很大的差異，較高層次的區分成高—中—低的尺度，有助於在不同社會或時期的職業結構之間進行比較。表2我們將作家傳記所陳述的父親職業或家庭背景加以區分成社經地位高中低如上。

就能取得父親職業的1/3家庭背景來分析，台灣作家的社會出身相對而言相當平均，雖然來自上和中層社經地位家庭比較多，但總體比例上沒有太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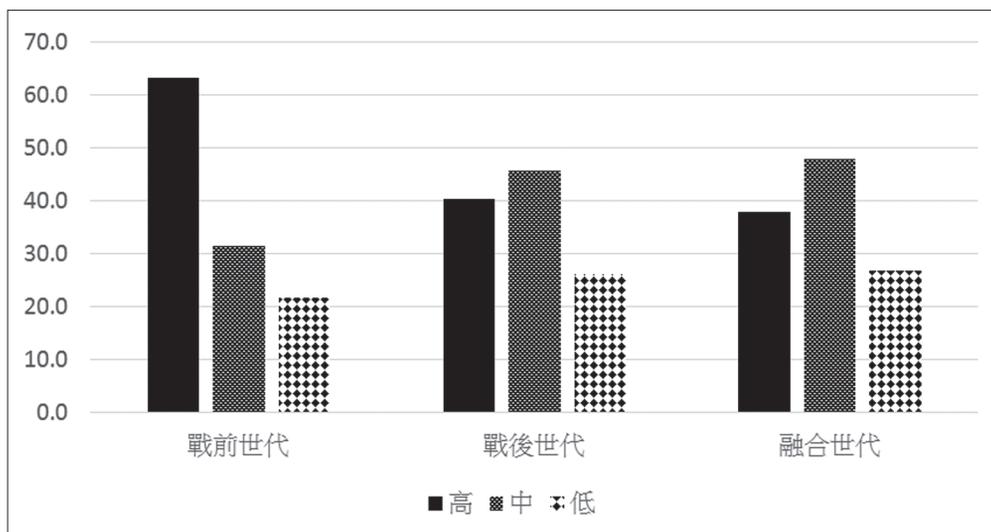


圖7 作家世代的社會出身

殊。男性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情形較女性平均，女性作家出身自上層階級的情況明顯地較高。類似的分布也呈現在省籍的差異上，一如前述外省作家多來自軍公教家庭，而本省作家則較集中來自於在農工商等部分，這也使得社會出身在省籍差異也呈現在外省作家多來自中和上層階級，但本省作家多來自中低的社會階層。至於不同作家世代的社會出身則有明顯的差距，圖7可以看出1930年前出生的戰前世代很高的比例是出身自表2所定義的上層階級，相對於戰後和融合世代（即1930年後出生），出身自上層社會的作家比較減少，而後兩者的社會出身則是以中層的社經地位最多。戰後世代（1930-1959）和融合世代（1960-1989）兩個30年分層世代作家人數雖然不同，但是社會出身的家庭的社經地位卻是相近，甚至來自社經地位高的家庭有減少的趨勢，而中層和底層長期而言卻有增加的趨勢。換句話說，過去近一個世紀以來，台灣作家的社會出身從父親職業的社經地位來看，有越來越趨平等的趨勢。從比較的觀點，這研究結果甚至比法國1850-1949年間的發展僅約1/4的作家人口來自小資和大眾階級，而台灣戰後則有約6成的作家人口來自中和低階層。⁴¹

樣本不足不只是最後兩個世代的問題，發生在父親職業的資料收集上。畢

41 目前沒有找到可以比較同時期的研究文獻。

竟，有父親職業紀錄的僅占全部作家的1/3。我們無法據此推論全部台灣作家的社會出身。但是這本來就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限制，無法在沒有條件限制下進行調查研究，因社會出身資訊直接涉及個人隱私權問題，因此以公開資訊為倫理的界限，符合一般社會生活的倫理界限，尊重個人隱私權。雖然父親職業資料僅占1/3，但進行對比分析多少可以幫助理解有資料的884位會比較集中在哪些特質上。結果發現不同世代作家對父親職業資訊公開情況會有很大的不同，大致上早先世代的資訊多，晚近世代的資訊少，而且呈現逐30年減少的趨勢。這意謂年輕世代不太談其父親職業或家庭背景，但另一方面由於年長或已過逝的世代作家研究的人，為他們寫傳記的也較多，更因為年長者不像年輕人那麼在乎家世背景對其作家身分的影響。是故，關於台灣作家的社會出身對早前的世代解釋力較高，而對近期的世代解釋力較低。

雖然在學術倫理的限制下僅獲得約1/3部分有父親職業的紀錄，但若以884位作家的社會出身來討論的話，在戰前世代（1940年前出生）傳統士族和父親在政府部門就職是主要的來源。這兩部門也都是現代國家建立時，新與舊社會菁英的主要棲身之所在，他們的子輩成為文化菁英的可能性就較高。戰前作家人口其次是來自於農、商和教育部門。教育部門是現代國家新式社會菁英的另一個重要來源之一，尤其民國時期的中國或日治時期的台灣，乃至於戰後的台灣社會，新式教育或戰後的國民教育提供了一大批新的社會菁英的就業機會，他們可能來自於傳統士族或來自於農村子弟因新式擴張的教育，而得以進入教育部門就業。而教師與教育部門的工作相對而言有利於其子女文化資本的累積。這種透過現代教育得以社會晉升的還有廣大的農家子弟，他們只要在社會穩定的和平時期並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來自於農業部門的文化菁英一直都有相當的比例。來自於農業部門的台灣文化菁英有兩個高峰，一是新式教育的開始年代即1900-1910出生的作家世代，另一個即是1940-1970出生的台籍作家，像鄉土文學世代。

戰後出生作家群的社會出身來自於傳統士族的延續少，政府的公部門與教育部門一直提供文化菁英的主要來源，加上中國在20世紀長期處在戰亂狀況，軍職成為新的快速晉升的社會流動管道，尤其是二次大戰快速生成大量的軍人

階級，再加上國共戰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外省軍人比例在戰後社會比例一直偏高，使得軍職成為繼傳統士族後，戰後世代文化菁英的作家的社會出身來源。再進一步來說，軍公教這三個部門原本就是外省族群的主要就業部門。這些外省的移民以其語言與文化的優勢占據了台灣文化場域的大部分位置，不只是在文學、新聞和藝術等領域也都是如此。有利的語言與文化使他們及其二代成為文化菁英的機會一直在197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都有顯著的影響。1960-1989年出生的融合世代，不只省籍分布趨近人口比例（省籍區分甚至已經消失），而且父親職業的分布在各部門也相對戰前和戰後世代都均等。但是融合世代的作家目前所收集到的數量尚少，必須等待更長的時間以及更多樣本人數後才能有定論。

七、多重職業活動

作家的職業生活是文學社會學研究的另一個重點。由於作家不像其他職業一樣有行會組織或同業公會，或是某種入行的身分認定都沒有。他們賴以為生存的職業活動，雖然不見得浮現在其多多少少綺麗的文學生活，但卻非常關鍵地影響他們的文學創作活動。作家是靠什麼而活？作家的經濟生活這個議題，一直是文學世界向來都避而不談的庸俗問題。一方面面對外界的眼光，他們會認為文學創作是精神高貴的活動，不該以低俗的金錢收入來衡量；另一方面也高度地遺憾並經常抱怨台灣文學創作的稿費過低，甚至欽羨日本、美國或香港的高報酬或作家生活。這種面對經濟生活的矛盾，更說明大部分台灣作家需要另一職業工作來維繫其生活的無奈，也使得作家的經濟生活此議題長期以來被排除在文學知識生產的領域之外。此外，原本應是社會學或甚至經濟學家研究的課題，卻因為文化人或因數量稀少，從來不是社會學關注的群體，或因他們所生產的文化產品不曾達到顯著水準的經濟規模與效應，所以不曾有經濟學家關注過作家的經濟生活。事實上，文學界長期以來一直都有對作家的職業活動寫下紀錄，每位作家的生平小傳大概都多少會紀錄該作家的經歷或職業。

和作家父親職業的操作一樣，我們以作家生平小傳關於職業經歷的紀錄所提到的職業類別進行整理分類，而不以社會學的現行社經量表分類或官方的職

業分類表，因為這才能更貼近台灣作家的經濟生活實況。唯一的問題是資料來源的「2007台灣作家」資料庫經歷欄，包括了作家所從事的職業活動與文學活動混雜在一起，有時很難去辨判何者是職業活動，何者為文學活動，例如文學雜誌的編輯、主編等文字工作的職位，因無從得知這些文字工作的給付方式與狀況，因而無法判斷該職位是否算是一份職業。其次，又像父親職業欄一樣，作家職業是一個生涯的歷程，往往會經歷好幾個不同的職業，而且他們會同時兼具幾個職業活動，如主業副業或多重兼職的情形。⁴² 因此，編碼紀錄職業時採用多重紀錄法，即依生涯順序連續紀錄被提過的職業，故以人次為計算。多重紀錄法雖然具有較完整呈現作家職業的實際狀況，但這也造成同一個人會被重覆計算，尤其對某些行業而言，頻繁換職位原本即該行業的常態，甚至是「高升」指標，如在媒體出版業。

面對這種每一個作家都可能有多重的職業／文學活動，過去「一人一職」的研究方法可能不再適用。我們必須將一個多職或多重職業特性納入研究設計。事實上以「2007台灣作家」資料庫收錄的作家生平而言，他們的職業經歷紀錄其實都非常完整。本研究只不過將這些紀錄加以結構化，分類歸納加以分析而已。圖8是根據「2007台灣作家」資料庫中作家經歷描述加以分類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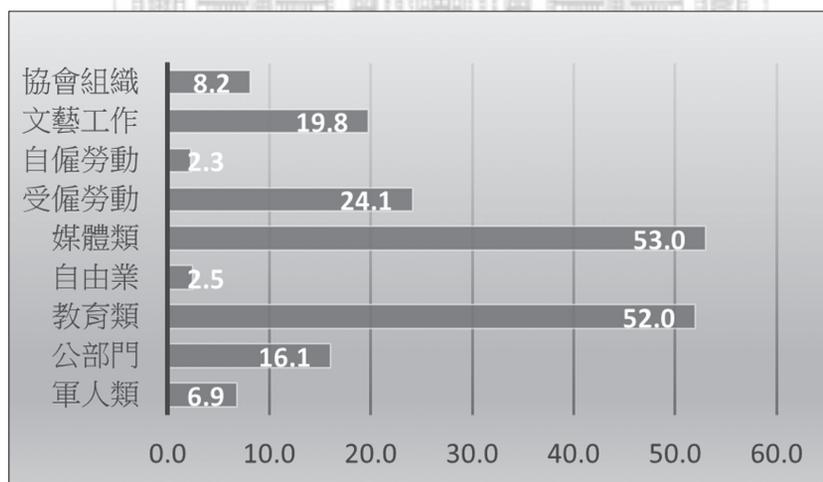


圖8 作家的職業分佈（人次）

42 由於所獲得的職業資料無法辨讀哪主業與副業，我們全部視為一份職業計算。

除了總人數外，表中的數字都是表示人次，即曾從事該類別的人次，不同經歷的人可能在不同類別重覆計算，但我們相信比「一人一職」的分類法更能反映職業生涯的複雜性。這種以人次為計算方式，雖可能重覆計算（至少在同一職業大分類內不會），但就理解整個作家人口的職業分布上卻不失為精確的方法。從職業多重紀錄看來，台灣作家曾做過最多的職業，就大分類而言是媒體類（這裡指的比較是生產者與讀者大眾之間中介角色（**media**）的行業出版、報紙、期刊雜誌、電台、影視或表演藝人等），幾乎超過一半以上的作家（53%）都曾在媒體類有過一段主業或副業的職業生涯，尤其以文字編輯相關的職位，這理所當然是作家經濟生活的主要來源。其中曾經任職於報紙與期刊雜誌類（主編、編輯或記者）最多約占媒體類（N=1401）的45.3%和48.5%，其次才是出版業（含社長、主編和編輯等職位者）34.8%，最後才是電台影視和表演藝人等也有25.5%。

出版業（不論是社長、發行人或主編、編輯者）的這些職業像出版、期刊雜誌等職位變動大，工作週期短暫，但最符合作家的「志業」的職業，既能以筆賺取微薄的錢又能以筆貢獻社會，對作家的象徵性資本（即聲譽）積累幫助最大。而媒體類的另一端媒介報紙，又更接近大眾娛樂的電台和影視的編劇等，則是作家能以筆賺取最多錢的職業。能夠「兼顧」（或說妥協）創作與市場的需求，但這必須創作被認可成名後，才能轉戰大眾娛樂的通俗市場，常見的就是以某作家的身分主持電台或電視的節目，一方面將原本曲高和寡的文學通俗化，另一方面也以作家的身分為庸俗的大眾娛樂加持文化。另一個大量常見棲身於媒體類的作家職業是記者，不論報紙、雜誌，甚至電台或電視媒體都有，他們平日為媒體撰寫新聞稿，同時也進行文學創作。

另一個台灣作家經濟生活的主要棲息之地就是在學校的教育機構。在台灣和其他地方相信教書可能最符合作家身分的職業，也是他們最理想的就業出路。不只社會地位高貴，既不減損「作家」的光環，更能因作育英才而彰顯此身分，再說工作收入非常穩定，可以在衣食無虞的條件下進行創作。而且這種收入更適得其所地「學以致用」將文學知識傳承給下一代，而不必負擔為市場妥協地賣文字的污名。教書成為作家階層心目中最理想的職業，更

因為擁有相對大量可調配的時間可寫文章創作，雖然不比能夠專事寫作的人能夠專心一意地寫作，但至少兩種活動較不衝突，未嘗聽聞因想專心寫作而放棄教職的作家。結果，全部台灣作家中約有52%曾經從事過教職，包括一生或部分生涯擔任過各等級教師、研究人員、兼任講師或教授、文藝講壇講師或補習班老師等。其中大專以上教師（包括研究人員）占大多數約846人次（超過教育類（N=1374）六成以上61.6%），其次才是高中以下的教師599人次（約43.6%）。即使前者排除兼任教授、講師或其他在大學兼課者236人還是有533人次，遠超過後者。毫無疑問地大專院校的教授中以中文及外文相關系所最多，⁴³ 其次是人文社會科學系所，理工醫學最少。有趣的是以外國大學的教授為職業的作家人數頗多，不論他們是否在國外從事文學研究，但大都以中文創作，還是以華文文化圈（其實是以台灣）為主要讀者對象。

不論以媒體類或教育類為棲身職業的作家中，基本上都是以男性外省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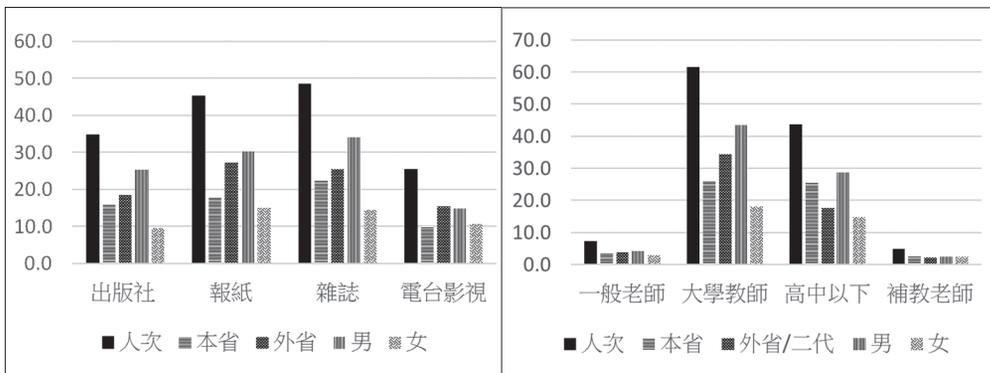


圖9 作家棲身媒體類別的百分比

圖10 教育類作家類別、省籍和性別

其二代為主體。任職於媒體類的作家不論哪一個與讀者接觸的媒介，外省及其二代都高於本省，男性也都多於女性，只不過差距多少而已。而在教育類的工作中，在大專院校任職過的男性遠大於女性，這比例差距懸殊甚於高中以下教師的男女比例。同樣的在省籍分布上也是如此任教於大專院校的外省及其二代作家遠勝過本省作家，但是在高中以下則相反，本省作家多過外省及其二代作

43 其中包括以文學為研究對象的中文和外文系教師研究人才。

家，尤其是任職於小學教師的作家省籍比例約本省7成：外省3成左右，相對比較接近總人口的省籍比例。這意味著在以教育類為棲身職業的作家群中，越是往高等教育等級時，外省及其二代的比例就越高，而相反越往初等教育等級時，本省籍的比例就會變高。

除了媒體與教育兩大類的職業外，台灣作家任職於在公營或私人公司上班的（包括公私立銀行）者（即圖8中的「受僱勞動」者）位居第三，24.1%的台灣作家曾經受僱於公私立的企業或公司，成為受薪階級的上班族。其實受薪勞動人口原本就是占總勞動人口中最大的職業人口，以此觀之，作家的職業來自於此也不驚訝。而且不只職業人口基數較大，工作時間也相對於自僱勞動者，有較多休閒的時間可以從事創作性的活動。倒是令人驚訝的是職位等級（例如經理以上的職位）並不影響受僱勞動者成為作家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雖然在受薪勞動狀況下，不同的職級所帶來的工作條件可能不同（像經理級以上責任較重，工作時間可能較長），以此為業的作家們還是能夠在這些條件下堅持不懈地創作，我們不得不說文學創作可真的是一種「志業」（vocation）。但真正以文學或藝術創作為志業者，不正是將整個或一段生命義無反顧地投入其中，以文藝工作為「職業」者，約占19.8%，位居台灣作家職業的第四，其中以專事寫作者最多。⁴⁴

表3 不同世代作家職業的百分比分布

大類	軍人類	公部門	教育類	自僱勞動	協會組織	媒體類	受僱勞動	文藝工作	自由業
1900以前	0.5	3.1	1.0	3.3	0.9	0.8	0.6	0.2	1.5
1900-1909	2.7	8.0	3.2	6.7	1.8	2.6	3.0	0.6	4.5

44 在作家生平裡，所謂「專事寫作」不能只當做（職業）類別名詞來看待，更有與作家身分的直接關係的意義。首先，作家身分最理想的「工作」狀態，雖然不見得是最理想的職業，但卻文學創作的活動而言，能夠全心投入寫作卻是作家夢寐以求的事。其次，從經濟生活的角度來看，還要追問這種能夠「專事」寫作的經濟和社會條件為何？如配偶的收入足以支撐家庭生活的作家，這些都是真正能回答台灣作家身分的問題，必須另闢專文來討論。

大類	軍人類	公部門	教育類	自僱勞動	協會組織	媒體類	受僱勞動	文藝工作	自由業
1910-1919	8.2	15.3	6.0	3.3	5.5	6.5	4.6	1.7	1.5
1920-1929	18.8	11.6	13.8	8.8	5.6	8.9	7.9	9.1	16.7
1930-1939	14.6	14.8	10.9	17.5	22.2	10.2	8.8	9.1	13.3
1940-1949	3.8	15.5	20.2	16.7	20.3	14.6	17.7	15.7	16.7
1950-1959	7.7	16.7	22.0	23.3	27.2	23.7	22.1	25.1	18.2
1960-1969	2.7	3.5	11.9	10.0	9.2	15.1	17.1	20.5	21.2
1970-1979	0.5	2.6	4.9	3.3	1.8	6.7	7.8	10.5	6.1
1980-1989	0.0	0.0	0.2	0.0	0.5	0.4	0.2	0.8	0.0
人次	182	425	1374	637	60	66	1401	522	217

1. 各世代的職業類別是以人次計，因此不同世代的百分比加總不等於100。
2. 同一人可能在不同類別重覆計算（不同經歷），但不會在同一類計算多次。
3. 灰底者代表該類比例最高的三個世代。
4. 協會組織指的是含宗教團體在內的各類民間協會的幹部與負責人，其中文學組織最多。

若我們將作家職業以10年分層世代作家的不同職業類別的人次，再以該類別職業的總數求其百分比（見表3），就可以從時間向度考察總體作家人口職業變化情況。為了簡化以方便了解上述變化的表格，我們將每一類占該類比例最高的三個10年世代以灰底標示，即可發現整體作家人口賴以為生的行業在不同時代的變化。每一職業類別所標示前三個比例最高的世代都與前三個以外的世代差距很大（除了父職和教職較平均外），顯示作家寄身於各類別有不同時代集中的現象。出生於在1920-1959年之間這個世代的作家人口較集中在軍公教這三類職業者，尤其是軍人作家非常集中在1920-1939的兩個世代。這似乎符合我們說台灣軍中作家多的「印象」，其實這種印象應該被修正，因為這個現象只集中在前述兩個世代，且曾經有軍人背景的作家也不多（182人次，

約6.9%），相對於法國19世紀作家尚未職業化前軍職作家人口約25%相距甚遠。曾任公職和教職的作家各個世代之間相對而言比較平均，但1940-1959年出生的兩個世代較多。而寄身於媒體、受僱勞動、文藝工作和自由業的作家則較集中在下一個世代即1940-1969年出生的三個世代為多。在公司受薪上班（受僱勞動）的作家和棲身於各類民間協會組織的作家也比較集中在1920-1959的三個世代。

總體而言，台灣作家寄身的職業大類，依次是媒體類（53%）、教育類（52%）、受薪上班族（24.1%）、文藝工作者（19.8%）、公部門（16.1%）、民間組織的各類協會幹部或負責人（8.2%）、軍人（6.9%）、自由業和自僱勞動者各僅占2.5%左右而已。這樣的作家職業分布結構，其實並不完全符合我們對他們職業的想像，例如從事軍公教多，事實上，軍人作家的比例很低，在政府機構等公部門工作的沒想像的多，除了較符合期待的新聞和教育類外，在公民營公司上班（工商類）的作家其實比例不少，甚至比公部門還多。而從事文藝工作等類別的文化生產者那就不意外了。

另外一個作家職業生活的社會屬性就是多重的職業活動，反映在作家小傳多重又複雜的經歷欄。戰後台灣作家在其職業生涯（或到2007年為止），轉換跑道的情形非常普遍，六成從事過兩個職業以上，甚至還有1/5的作家（592人）甚至還從事過三個職業以上，其中以曾經從事過媒體、教育和受僱於私人公司（受僱勞動）者最多，有122人，而在媒體、教育和公務部門待過的人也有112人。甚至還有114人曾從事過四種以上的前述職業類別者。經歷最豐富者該屬鍾鼎文，根據他的簡歷介紹，共計六種不同職業類別：「投身國民黨文宣與政界，抗戰前曾任南京中央軍校教官、上海《天下日報》總編輯、復旦大學教授、國民大會代表。來台後，歷任《自立晚報》及《聯合報》主筆、台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祕書長，發起組建『世界詩人大會』，為榮譽會長，並任世界藝術文化學院院長。現已退休」。

不只經歷豐富時作家這個職業身分的社會特徵，即使在媒體類內部變換職位最頻繁（從事業媒體業的作家之中有19%曾在此行業內部經歷三個以上的職位變動），有些作家甚至還是全媒體人（即在曾待過出版、雜誌、報紙與影視

電台有13人），在出版、期刊和雜誌三棲過的作家更高達94名，其他媒體內部三棲者也有34-36名之間。

八、結論

本文限於篇幅，僅能對台灣作家人口進行社會人口學鳥瞰式的描述。這是學界第一次較完整地以社會科學式的視角來了解台灣作家人口，也是了解台灣文化菁英的第一步基礎。我們突破了過去僅以作者論或是場域論的研究方法，相對主觀地只注意到少數文學界的卓越作家所進行的研究與分析，進行將研究焦點集中在廣大但可能「默默無聞」作家群體的社會特徵。本文以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庫的2,638位作家做調查對象，以傳記集合法進行社會人口學的描述。幾個以作家為群體的文化菁英特徵：作家的性別、省籍和世代分布，以及社會出身都與1949年後移民結構有密切相關，而造成早期世代以外省男性軍公教職業為主的特殊現象，1960年代後的作家稍微從此歷史特殊結構解放，包括省籍和性別的差距趨緩。教育成就雖然是使得性別與省籍平均化的重要結構性因素，但也儼然是讓台灣文化菁英大洗牌的新限制門檻，尤其是最近幾個世代達到沒有大學畢業幾乎不太可能成為作家的地步。雖然，因為尊重隱私權的倫理限制下，僅收集到約1/3作家的父親職業，就僅有的資料來看，做為文化菁英的台灣作家，戰前世代的社會出身來自傳統士族、公部門、農業和商業部分多，但戰後世代則出自軍、公部門以及農部門為多，融合世代則以軍、教和商業部門為多。文化菁英的社會出身，若以父親職業來理解的話，也與戰前中國和台灣的社會結構的歷史變遷有密切關係。至於社會出身的歷史變遷是否影響寫作風格則需等待另一篇處理。最後，本文也觀察到作家賴以生存的職業中以新聞與教育類最多，而這種工作條件（如時間運用）會不會影響台灣作家寫作的文類選擇如散文為大宗的文類生產？但由於篇幅關係只能另外探討。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山内乾史，《文芸エリートの研究—その社会的構成と高等教育—》（日本東京：有精堂出版，1995）。

張誦聖著，劉俊、馮雪峰等譯，《台灣文學生態：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中國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2016.09）。

應鳳凰，《文學史敘事與文學生態：戒嚴時期台灣作家的文學史位置》（台北：前衛出版社，2012.11）。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12）。

Alain Viala,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9).

Bernard Lahire, *La Condition littéraire. double vie des écrivain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 *Le travail sociologique de Pierre Bourdieu : Dettes et critiques* (Paris : La Découverte, 2001).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Gisèle Sapiro, *La Guerre des écrivains (1940-1953)* (Paris: Fayard, 1999).

James Smith Allen, *Popular French Romanticism: Readers and Books in the 19th Century*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William Kingston & Jonathan R Cole, *The Wages of Writ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bert Darnton, *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Paris: Seuil, 1993).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山内乾史，〈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文芸エリートの社会学的考察〉，《教育社会学研究》47期（1990），頁125-141。

王宏仁，〈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階級結構與流動初探〉，《台灣社會研究》36期

(1999.12)，頁1-35。

王梅香，〈不為人知的張愛玲：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下的《秧歌》與《赤地之戀》〉，《歐美研究》45卷1期（2015.03），頁73-137。

——，〈文學、權力與冷戰時期美國在臺港的文學宣傳（1950-1962年）〉，《臺灣社會學刊》57期（2015.09），頁1-51。

吳乃德，〈高等教育成就的族群差異：學費補貼、職業情境、與世代差異〉，《臺灣社會學刊》52期（2013.06），頁1-30。

路丹妮、陳正賢，〈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台灣文學學報》27期（2015.12），頁153-190。

范雲、張晉芬，〈再探台灣高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9期（2010.09），頁259-290。

黃美娥，〈戰後初期台灣通俗小說初探——從「作家論」到「場域論」的考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6期（2018.04），頁185-220。

蔡淑鈴、瞿海源，〈台灣教育階層化的變遷〉，《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卷1期（1992），頁98-118。

蘇碩斌，〈旅行文學之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9期（2014.09），頁255-286。

駱明慶，〈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29卷2期（2001.06），頁117-152。

劉乃慈，〈九〇年代台灣小說與「類菁英」文化趨向〉，《台灣文學學報》11期（2007.12），頁51-74

——，〈九〇年代台灣小說的再分層〉，《台灣文學研究學報》9期（2012.10），頁69-104。

Gisèle Sapiro, "Mesure du littérature : Approches soci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Histoire & Mesure* Vol.23, No.2 (2008), pp. 35-68.

M. Bolkéus Blom,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cohort-based inquiry into the US Literary field", *Poetics*, Vol.30 (2002), pp. 311-325.

（二）學位論文

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Rémy Ponton, *Le Champ littéraire de 1865 à 1906 (recrutement des écrivains ; structures des carrières et production des oeuvres)* (doctorat thesis, Paris: Université Paris-V, 1977).

三、電子媒體

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庫。

Jennifer Schuessler, “Reading by the Numbers: When Big Data Meets Literatur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30, 2017, (URL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30/arts/franco-moretti-stanford-literary-lab-big-data.html>).

